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CHINA UPDATE BOOK SERIE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中国经济增长 与发展新模式

主 编

〔澳〕郢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中国经济增长 与发展新模式

主 编

〔澳〕邵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F124
372



北航

C172199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澳) 郅若素 Garnaut R., 蔡昉, 宋立刚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3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ISBN 978-7-5097-5491-7

I. ①中… II. ①郅… ②蔡… ③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256 号

·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

主 编 / [澳] 郅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林 尧 高 雁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谭晓明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491-7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20.5

字 数 / 34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撰稿人

(按章节写作顺序)

Ross Garnaut: 墨尔本大学校长特聘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 墨尔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特聘教授, 堪培拉。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北京。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 堪培拉。

Dwight H. Perkins: 哈佛大学, 马萨诸塞州。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彭旭: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苟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Huw McKay: 西太平洋银行, 悉尼;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 堪培拉。

Rod Tyers: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珀斯。

Ying Zhang: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珀斯。

Tsun Se Cheong: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珀斯。

周伊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堪培拉。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北京。

孟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 堪培拉。

Christine Wong: 牛津大学, 牛津。

王小鲁: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北京。

余静文: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北京。

樊纲: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北京。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上海。

Jane Golle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中华全球研究中心, 堪培拉。

张永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Simon Wensley: 力拓能源集团, 布里斯班。

Stephen Wilson: 力拓能源集团, 布里斯班。

Jane Kuang: 力拓能源集团，布里斯班。

王碧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余森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李坤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施炳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目 录

CONTENTS

中国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新战略：责任与启示

..... 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 1

适应新发展模式的制度安排 Dwight H. Perkins / 16

中国发展中的新常态

..... 黄益平 蔡 昉 彭 旭 苟 琴 / 31

中国人口红利的终结：一个潜在 GDP 增长的视角

..... 蔡 昉 陆 旻 / 50

中国的工业化：路径依赖及转向新模式

..... Huw McKay 宋立刚 / 67

中国储蓄和全球经济表现

..... Rod Tyers Ying Zhang Tsun Se Cheong / 86

成长为创新型经济体：来自中国企业层面数据

分析的发现 周伊晓 / 110

中国农村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李 周 / 128

城乡人口迁移的趋势及政策影响：2008 ~ 2012 年 孟 昕 / 147

为实现长效发展而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

..... Christine Wong / 165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2013 年报告（摘要）

..... 王小鲁 余静文 樊 纲 / 188

中国能实现绿色工业吗?	陈诗一 Jane Golley / 222
中国能否实现绿色发展	张永生 / 238
国际背景下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 澳大利亚与 中国的难题	Ross Garnaut / 250
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和能源政策三难困境	Simon Wensley Stephen Wilson Jane Kuang / 267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约束	王碧珺 余森杰 黄益平 / 285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决定因素: 来自企业 层面的经验证据	李坤望 施炳展 / 301

中国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新战略： 责任与启示

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政策和结构方面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对于提高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绩效、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都很有必要。成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变革的内驱力之一。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及真实工资迅速上涨给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资源和收入分配、自然环境、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与国际资本流动等都有所变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在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引发了上文所述的种种变化，而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改革亦会改善现状，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更加公平，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变化既全面又深刻，所以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考虑这些变化。本书指出了无节制投资扩张型增长模式的不足之处，并阐释了传统增长模式是如何过渡发展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

本书展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后续的章节介绍了对于这类理论创新的深刻见解，并指明了理论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本书还介绍了中国与国际经济互动模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一个经济体一旦踏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就永远不会停下增长的脚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让中国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道路，使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经济。自此以后，中国就沿着改革道路不断前行。

改革快速而持续地进行着。每年的改革都会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藩篱，出台富有挑战性的新政策，提出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及促进经济活动的新模式。虽然改革是连续的，但如果我们从全局角度回顾过去的改革路线，就会分辨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策和结构上的转变。转变之后，国家发展才会迎来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在这六年中，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第二个阶段是1985~2011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无节制的投资扩张。第三个阶段始于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将朝着现代经济转型。

在经济制度方面，有两大创新为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铺平了道路。这两大创新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产品价格制度的变化改善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也使中国的制度改革更加顺畅。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日趋平等的分配制度为更普遍意义上的市场导向改革和更深远的城市经济制度改革打下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伴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进行，并为日后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外贸易、国际投资、金融体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的酝酿期和孵化期。从更基础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重建以及党的建设和公务员的全面改革等，都是未来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的形式主要是经济转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无节制的扩张，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工业投资被放到了首要位置，投资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甚至在21世纪最初十年达到了50%左右，如此高的投资比例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出现的现象主要有：储蓄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储蓄被用于国内投资；快速扩张的工业生产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但工资的增长幅度却不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对工业出口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起先出口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其技术含量很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复杂的、资本密集度高的元素成为产品链条中越发重要的一环；钢铁和能源的使用更加广泛；等等。以上这些现象对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失衡、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平配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

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可以使我国从低起点迅速赶上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国与全球市场在商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等方面的不断深化与融合。

无节制投资扩张的诸多特征也在相互作用。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和稳定的真实工资率提高了利润，而收入中储蓄份额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得投资份额日趋增加，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1985~2011年，无节制的投资扩张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早年（1985~1992年）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国际化的经济增长寻求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基础。

集体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村镇企业，是早期中国工业产出快速提高和就业率增长的关键力量。自1992年起，私有制经济代替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而其中一些私有制经济体，是由以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过私有化改革形成的。1998~1999年，中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09年，中国经济又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此时，无节制的凯恩斯式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对中国而言就十分重要，它使中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增长势头。然而，这种政策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在21世纪的头十年，大型国企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使得私营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力量被削弱。

无节制的投资扩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活动。1992~2011年，中国的产出增长就一直十分强劲，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这也是历史上最强劲的可持续增长水平，其增长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自二战后到1973年的那段辉煌时期。从人均收入来看，无节制的投资扩张也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逐渐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总储蓄额和国际投资盈余。同时，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额。按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中国在几年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主要汇率换算，中国在2020年前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中国依靠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过21世纪最初十年的发展，这种方式已经接近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经济接近极限水平的种种前导指标中，平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临界水平。过去，在这一水平上，其他东北亚国家都经历了增长模式和增长率的变化。截至2009年底，中国按真实购买力计算的人均收入与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情况十分类似。而几年后，日本的经济就逐渐从迅猛增长过渡到缓慢增长。

从大约 2004 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产出增长的幅度，这给传统增长模式带来极大的挑战。2012 年，劳动年龄段人口开始减少，这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国际经济环境对传统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利。虽然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在 2007 年，经常账户盈余超过了 GDP 的 10%）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但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却引来了大量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批评。批评人士没有注意到，尽管其他国家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但正是由于中国的巨额盈余，才使得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得以维系。在金融危机后，尽管新兴市场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地理版图上的扩张，但老牌工业国家增长放缓却使中国的出口扩张机会大大减少。

截至 2009 年底，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已接近社会和政治上所能承受的极限。城乡差距、普通劳动者和资本与权力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成为日益活跃的大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为了城市建设而强行征用农民土地，也是无节制投资扩张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中国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导致中国在 2009 年 12 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遭遇外交困局。2013 年初，中国社会也逐渐开始关注国内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在 2012 年全年及 2013 年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公众对政府腐败的长期关注将会是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原因，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助长了公共权力使用方面的腐败。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从 21 世纪最初十年开始，中国的学者和部分有思想的官员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人们对中国发展的期望逐渐提高，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虽然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并没有走到尽头，投资扩张在几年之内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须走上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道路。如果转型太晚，中国改革的压力和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本书的几位作者观察到，自2004年起，经济力量（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变）倒逼中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结构改革。逐渐上涨的真实工资和真实汇率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中国的决策机构和政府高层也更愿意适时加入关于推进改革的讨论，以便更好地进行政策调整。

因此，中国进入了第三次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时代，向着先进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经济转型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工业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份额逐年下降，二是用于扩大教育覆盖面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投资越来越多，三是消费和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逐渐增大，四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五是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快速的结构改革。

这些改革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已显著降低，资本集聚对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如果必要的体制改革能够促进经济转型，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但这可能会使当前的产出平均增长率比过去依靠投资发展的时期低2~3个百分点。

经济制度方面的必要改革要求限制使用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重蹈覆辙。只有强化公共财政制度，中国才能避免经济衰退。这意味着将面临可能出现的增速下降，尽管人们希望政府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来避免衰退，但由于刺激措施将增大结构性改革的成本，因此政府会逐渐接受适度的经济周期下行，而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凯恩斯式的刺激手段。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宜居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更多的关注：节能减排成为“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的主要目标。

虽然缩小贫富差距是政府在改革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政策目标，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仍需采取多方面的行动，还要出台大量强有力的政策。自2008年起，实际工资的上涨为缩小贫富差距做出了重大贡献。本书提供了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卫生、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支出数据。数据显示，政府对以上几方面的支出在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以官方数据衡量的不平等程度也开始下降。

对于在中国各地的人们来说，政府愿意接受新经济增长模式十分重要。本书将试着对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诸多特征进行研究。

二 本书的结构

在朝着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新增长模式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对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有效建设。Dwight Perkins 为本书将在之后呈现的内容打下了一个理论基础。

Perkins 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部分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再从本质上修改一部分制度，最后还要替换余下的制度。此外，中国的监管体系也要做出重大的改革，因为监管体系涉及政府经济决策、法律体系、土地所有权以及政府收入来源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体系。

此外，Perkins 还指出，目前政治体制安排的许多特征都导致大面积的腐败，这将威胁中国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这些领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对生产力的强劲增长也十分重要。如果经济转型能使中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十分有必要。这些重要改革包括处理好城镇化、社会福利制度和中国人人口结构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金融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等制度安排方面的进一步改革。

中国已经废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并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 Perkins 仍然指出，调整基本面上的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要比单纯废除旧制度难得多。这一过程需要时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收入将会上涨，经济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进而导致 GDP 增长率不可避免地放缓。

黄益平、蔡昉、彭旭和苟琴把中国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新模式称为“新常态”。他们在本书的第三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转变已经起步。经过一系列评估后，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潜力已从 21 世纪最初十年每年 10% 的增长率下降到 2010 年后 6% ~ 8% 的年均增长率。过去，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顺差是最大的，而现在，中国的顺差正逐渐减少，慢慢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中国经济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消费占 GDP 的比例较低，二是以基尼系数为指标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长期以来，人们都不希望看到上述两种现象，也都普遍认为这两类现象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消费占 GDP 的比例

开始上升，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

黄益平、蔡昉、彭旭和苟琴认为，要素市场的改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是中国经济向新增长模式转型的原始驱动力。近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显现，由此也使工资迅速上涨，随后又引起了当下中国经济向着“新常态”转型。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的结构却在向新的均衡状态调整。几位作者认为，下一步改革应该着眼于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建立健全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除此之外，政府的角色还应有所转变。过去，政府通常直接参与支持生产和投资的活动。现在，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几位作者的结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中国十分有必要，可以帮助中国完成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和陆旸认为，随着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的减少，过去30年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正在减少。他们预计，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2%；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下降至6.1%。未来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经济改革的范围，尤其是发展新兴经济领域，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作者还提出了两个模型，说明劳动力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显著提高GDP潜在增长率。基于这一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会一直下降。

在向发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从过去严重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旧模式中走出来。现在，中国应通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新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接受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在无节制的投资扩张时期，政府习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时期，政府就必须停止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扩大公共投资。新的政策应该通过调整供给面因素来促进增长，而不是调整和管理需求面。

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政府在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司治理和政府系统的高效运转。

在第五篇文章中，Huw McKay和宋立刚描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相对

于中国的人均收入而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过高，城市化程度过低，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依赖出口的程度又太高。他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中的某些方面，不利于把对环境的破坏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不利于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

接着，Huw McKay 和宋立刚概括了政策方面有待改进的地方。只有通过政策改革，中国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这些改革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加快金融改革来减少要素市场的扭曲；二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和服务流动；三是继续推进基于市场定价的能源价格改革；四是向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环保税；五是优先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其次才是满足工业产能投资；六是着眼于长期财政政策，其中，长期财政政策对整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决策十分重要，而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理顺资源分配关系也很有必要。

最后，McKay 和宋立刚得出结论：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最高目标是减少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结构，并通过拉动内需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从根本上说，这些目标是互补的。他们也提出，尽管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框架，以尽可能实现这些内在互补的目标，但是，在这些政策框架中，某些政策和制度改革领域必然存在政治斗争。其中，市场竞争政策受到的政治阻力最大。

中国的高储蓄为巨额的国内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除去国内投资，中国的巨额储蓄还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主要融资来源，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高负债率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点，即官方语言都为英语。在第六篇文章中，Rod Tyers、Ying Zhang 和 Tsun Se Cheong 讨论了中国储蓄率下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需要降低来自家庭、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储蓄。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更加依赖内需推动增长，那么，中国用于国际投资的超额储蓄将会减少。而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消费的增加会减少家庭储蓄，寡头利润的减少及金融的发展将减少公司储蓄。近期，省级债务的增加也削减了政府储蓄。与此同时，日本的储蓄率也在下降，“亚洲储蓄过剩”的时代就此终结。最终，全球的借贷成本都将被推高。尽管最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借贷成本暂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借贷成本升高的大趋势难以阻挡。

中国的储蓄减少将导致全球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引起世界范围内

的投资量减少。

随后，Tyers、Zhang 和 Cheong 讨论了中国储蓄率下降对美国资本市场及投资的影响。美国融资成本的上升最终无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北美洲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强化了财政纪律，以便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伴随着全球总储蓄额的下降，强化财政纪律也减少了出现赤字的国家的融资需求，但同时也减轻了中国总储蓄额下降对全球私人投资的影响。然而，如果不强化财政纪律，那么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又会在老牌工业国家中卷土重来，量化宽松政策也会随之停止，全球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紧缩。

从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说，中国将越来越关注其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与此同时，虽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寻求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目前并不是正确的投资时机。

中国越接近全球生产力水平的前沿，创新就对中国越重要。在第七篇文章中，周伊晓讨论了制度怎样影响中国的创新能力。通过对企业层面上的数据进行分析，她发现，制度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在创新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分析表明，如果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活动的主体，那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设定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周伊晓还指出，要想使中国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参与全球科技研发，为全人类的科技和知识进步做出贡献，第一步就是要改进国内的制度安排。

在 1978～2012 年的改革期中，农业部门的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八篇文章中，李周回顾了过去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并讨论了农业部门如今面临的挑战。他认为，通过深化农业改革（包括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改革），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给农民提供社会支持和保护，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改善食品消费结构，减少农业资源浪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政策手段，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完全可以处理好来自农业部门的挑战。

李周还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与农民、农村和农业相关的领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的农村正进行着迅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也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运作方式。最后，李周给出结论：政府在制定

政策时，要重点考虑完善城市化进程中的市场交易体制，同时要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性的基础上，为迁入城市的农民和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政策应当顺应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而不应背离农民的意愿，这样的政策才会有助于经济转型。另外，更加民主的地方管理手段也将有利于农村今后的发展。

在第九篇文章中，孟昕使用“中国城市与农村移民项目调查”所提供的农民工收入和人口数据，来描述过去十年城乡间人口迁移的重要特点，并讨论了未来中国应实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从数据中得到的结果表明，尽管已有将近30%的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工作，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城市的新增劳动力仍然来自农村人口。留在农村的人是否迁往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的缺失，挡住了很多人迁往城市的脚步。即便这些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他们也只是停留平均8~9年。如果他们的停留时间能比现在多一倍，城市里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就会比现在多一倍。孟昕的另一项发现是，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迁到城市的第24年达到峰值。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停留时间远远不足24年，这意味着延长农民工的停留时间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的停留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政策所影响。虽然身在城市，但是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极长。这也间接反映了农民工得不到较好的劳动保护。同时，工作时间过长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因此，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改革，应当被予以重点关注。

在第十篇文章中，Christine Wong 研究了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现状，并讨论了如何提高财政总量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诸多政策建议中，她着重讨论了公共债务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如何使得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的。Wong 重点关注了亟待改革的两个重要领域，一是长期存在的预算外资源漏洞和分散的预算控制权，二是公共投资过度的趋势。改革在这两个领域内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Wong 长期关注以上两个领域。她发现，目前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的根源在于财政体系脆弱。她建议中央政府收回宏观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维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为此，中央政府必须建立地方政府发债的基本制度框架，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和投资需求，同时引入监督和管制体系，要求地方政府汇报负债情况。